



子女数、居住方式与家庭代际支持 ——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

殷 俊 刘一伟

摘 要: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影响了老人家庭代际支持,且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首先,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子女数显著提高了老人获得经济支持与精神支持的概率;但女儿数与农村老人照料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其次,对城镇老人而言,与配偶居住挤入了子女的经济支持,但对老人获得精神慰藉起到了负向影响;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分别降低了老人获得精神支持和照料支持的概率。对农村老人而言,与配偶居住在挤入子女经济支持的同时,却挤出了子女的精神慰藉与照料支持;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对老人获得精神支持和照料支持起到负向影响。子女数调节了居住方式对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即一个理想化的结果是:子女在尊重老人选择居住方式的同时,弥补因居住方式导致家庭代际支持的缺失。

关键词:居住安排;子女数;代际支持;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13;D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7)05-0066-12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①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21亿人,占16.1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3亿人,占10.47%。同“六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89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甚至有报道指出,到2050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然而,由于我国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政策与服务体系还不完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仍将家庭看作老人生活的重要支持,家庭代际支持依然是老人生活的主要依靠(熊波、石人炳,2014:59-64)。但是,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弱化了扩展的亲属关系,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加松散,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Goode,1963:162)。因此,社会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传统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又将如何影响老人的福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事实上,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制度之一,子女在成年后对父母的反馈或支持现象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费孝通,1983:7-16;Lee et al.,1994:1010-1041)。Whyte & Parish(1984)、Logan et al.(1998)认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父母年老后与子代同住并接受子孙的赡养,是传统家庭代际支持模式。有学者研究发现子女数的减少及两代居住方式的分离不会影响子代对父代的家庭支持(桂世勋等,1995:1-6)。得出相似观点的还有谢桂华(2009:149-168),他们认为传统孝道观念与家庭伦理决定了家庭结构与代际支持的关系,

^①按照国际惯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说明该国家或地区迈入老龄化社会。

子女数和居住方式并不能改变代际支持。然而,有学者指出随着子女数的减少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家庭代际支持功能会有所削弱(王硕,2016:78-83)。可见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在学术研究领域仍未达成一致,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仍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数据研究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无论是居住安排、子女数还是家庭代际支持,我国城乡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与农村相比,城镇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更为严格,这不但影响了家庭结构和禀赋积累,还导致家庭规模更小(石智雷,2014:83-94)。另一方面,相比于城镇,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家庭与土地,导致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社会距离不断拉大,子代无法在家赡养老人(胡仕勇,2013:35-40)。此外,与农村相比,城镇社会变革与转型更为迅速,西方个体化思想严重地侵蚀着家庭代际支持的伦理基础——孝文化(杨复兴,2007:182-186)。这些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在家庭代际支持中所起的作用,进而对我国老年人如何实现“老有所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以城乡差别的视角分析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本文使用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探讨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在家庭代际支持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两者交互作用对家庭代际支持有何种影响。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家庭结构也出现了较大变迁,这种变迁主要表现为家庭规模的缩小及居住形式的改变(杨菊华,2011:19-33)。与此同时,受现代化观念与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原新,1999:5-8),家庭子女数也逐渐减少。在家庭结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我国家庭养老功能也在削弱。子女为老人提供家庭代际支持是家庭养老的主要依赖,而子女数减少降低了代际支持的潜在资源,居住方式则有可能限制代际支持某些方面的提供能力(王硕,2016:78-83)。目前,针对子女数与家庭代际支持关系的研究,学界还没有得出一致结论。夏传玲、麻凤利(1995)首次指出子女数对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影响。受社会交换代际转移理念的影响,桂世勋等(1995:1-6)提出了“填补”理论,该理论强调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度应该与老人实际需求保持一致,能够维持老人正常生活。换言之,子女的净经济支持金额并不以子女数多少为转移,而是“填补”年老父母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金额(刘一伟,2016:77-89)。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狄金华等(2014:65-72),他们指出子女数对老人养老资源获取没有显著影响。

然而,部分学者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郭志刚、张恺悌(1996)研究发现子女数与经济支持呈显著正向关系,代际支持在老人的经济供养中占据着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子女对父代的照料体现了他们对赡养义务的认可,每个子女都有义务照料父代。因此,子女数对经济支持有积极影响;同时子女对父代的照料又是子女间责任的分享与分配,子女数越多,每个子女对父代的经济支持越少(罗根、边馥琴,2003:46-52)。值得指出的是,Zimmer & Kwong(2003)研究发现父代所获得的日常照料与子女数呈现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即当子女达到一定数目之后,子女数与老人获得日常照料的概率呈现静止的关系。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涉及居住方式对家庭代际支持影响。夏传玲(2007)认为无论是居住方式还是子代对父代的支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均反映出传统家庭结构的延续和孝顺父母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不断再生,且证实居住方式改变了子女的家庭代际支持。如刘一伟(2016:77-89)研究发现子代对父代的日常照料并没有因为居住的分隔而发生中断。得出相似观点的还有鄢盛明等(2001:130-142),他们认为在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下,子女给予家庭代际支持取决于父母的真实需求,而非受居住方式、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制约。如果父母需求程度比较高,如年龄较大、健康状况较差或者社会经济地位低,老人获得家庭代际支持反而更多。

但是,有学者对这种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现代化、城市化及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改变了原有的居住方式,侵蚀了传统孝道的价值观(徐蒙、陈功,2009:33-36)。谢桂华(2009:149-168)研究发现,有子女

同住者得到更多的关心与照顾,而空巢家庭父母从子女处获得的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较少。王硕(2016)指出,与子女同住影响老人获得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与照料支持的概率。狄金华等(2014)认为居住模式和居住距离对老人从子女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有显著影响,但对精神慰藉没有显著影响。此外,Zimmer & Kwong(2003)等研究发现与儿女同住的父母获得日常照料的概率更高;但从子女的角度来看,不同父母居住的子女给予的经济资助高于同住子女,这一结论在农村更为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近期有学者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洞见,即基于城乡差异的分析视角探讨社会养老与家庭代际支持是互补还是替代,发现社会养老不但弱化了子女对城镇老人的精神慰藉,还挤出了子女对城镇老人的经济供养;而社会养老仅对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起到负向效应,对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与经济供养没有起到显著的效应。更进一步,作者点出城乡差异的原因在于居住方式起到了调节效应,进而作用于社会养老与精神慰藉及生活照料的关系(刘一伟,2016:77-89)。该项研究间接指出了居住方式能够影响家庭代际支持,但并未深入探讨子女数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

纵观已有文献可以发现,作为研究老人问题的方向之一,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相应争论的解释机制往往偏重一点、不计其余,而解释机制分析则往往不全面,且缺乏说服各方达成一致的充分理由。其次,以往研究大多将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分开论述,但子女数与居住方式作为家庭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密不可分;同时二者交互作用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验证。最后,我国家庭代际支持存在异质性,但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对此,本文以城乡差异的视角,在分析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对家庭代际支持影响的同时,也以解决上述问题作为出发点和目标,以期解决以往研究的不足。

三、数据、样本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该调查重点关注中国老年人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该次调查重访了2008年访问过的3802名男性老人和4603名女性老人(共计8405人),同时新增被访者1783人,包括801名男性和982名女性,因此,在2011年的调查中共有603名男性和5585名女性被访者。根据问卷设计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和需要,经过筛选,本文剔除缺乏相关变量的样本,最终选取的样本量为5870,其中城镇样本2723,农村样本3147。

(二) 变量界定

本研究旨在考察家庭结构与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关系,主要因变量为被访者是否获得家庭代际支持,操作化为“经济支持”、“精神支持”与“照料支持”。在调查问卷中,本文选取“您的子女(包括同住与不同住的所有孙子女及其配偶)给您现金(或实物折合)多少元?”,定义为“经济支持”,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供养中只选取子女的供给,孙子或者孙女等给予的供给剔除。此外,本文将“与子女交谈”、“向子女求助”及“与子女分享想法”等三个问题合并,定义为“精神慰藉”;将“当您身体不舒服时或生病时主要是谁来照料您?”,定义为“照料支持”,上述变量,如果是子女提供的赋值为“1”,不是子女提供的赋值为“0”。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是“子女数”与“居住方式”。选取“您现在有多少存活儿子和女儿”作为子女数,具体分为“女儿数”与“儿子数”,该变量为连续变量。此外,将问卷中“您现在与谁住在一起?”进一步操作化为“居住方式”,回答分别是“家人、独居或养老院”,其中将回答为“家人”的样本,做进一步细分,分为是“与子女居住”还是“与配偶居住”。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以老年人“与子女居住”为参照组,赋值为“0”,其他居住方式为对照组,原因在于“与子女居住”是老年人获得家庭代际支持的通常途径。

另外,遵循文献的传统,在控制变量方面,考虑了被访者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区域类型。个体特征包括性别、户口、年龄、教育、婚姻、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水平;社会经济特征包括职业类型、社

会保障；区域特征分为东部、西部与中部^①。各变量的界定与统计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百分比或均值)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差异性
经济支持(元)	连续变量	1970.52	2269.04	0.0003
精神支持	0=否	33.65	37.15	0.0004
	1=是	66.35	62.85	
生活支持	0=否	41.81	49.70	0.0000
	1=是	58.19	50.30	
子女数	女儿数	1.80	1.73	0.0225
	儿子数	2.02	1.87	
居住方式	0=与子女居住	47.07	47.19	0.8067
	1=与配偶居住	32.64	34.89	
	2=独居	19.1	14.65	
	3=养老机构	1.19	3.26	
养老保险	0=否	80.29	73.34	0.0000
	1=是	19.71	26.66	
新农合	0=否	15.16	49.97	0.0000
	1=是	84.84	50.03	
城镇职工医疗	0=否	97.56	83.98	0.0000
	1=是	2.44	16.02	
城镇居民医疗	0=否	97.9	87.89	0.0000
	1=是	2.10	12.11	
公费医疗	0=否	98.48	92.94	0.0000
	1=是	1.52	7.06	
性别	0=女	55.72	54.11	0.1101
	1=男	44.28	45.89	
年龄	连续变量	85.85	85.79	0.7902
教育(年)	连续变量	1.80	2.85	0.0000
婚姻	0=丧偶	60.62	60.25	0.8102
	1=配偶健在	38.39	38.55	
自评健康	0=不健康	17.60	17.12	0.5469
	1=健康	82.40	82.88	
职业类型	0=公务员	3.14	11.91	0.0000
	1=工人	5.56	22.58	
	2=农民	83.69	54.09	
	3=其他	7.61	11.42	
家庭收入(元)	连续变量	24319.98	35725.54	0.0000
区域	0=西部	18.90	19.88	0.1414
	1=中部	22.98	18.52	
	2=东部	58.12	61.60	

注：显著性水平***p<0.01,**p<0.05,*p<0.1。

在代际支持方面,农村老人平均每年得到子女经济支持 1970.52 元,66.35%老人获得子女的精神支持,58.19%老人获得子女的照料支持;在城镇户籍老人中对应的均值或比例分别为 2269.04 元、62.85%和 50.30%,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在家庭代际支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就子女数而言,城镇老人平均有 1.73 个女儿和 1.87 个儿子,农村则平均有 1.80 个女儿和 2.02 个儿子,城乡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在居住方式方面,农村老人与配偶居住、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的比重分别是 32.64%、19.10%和 1.19%;城镇老人与之对应的比重分别为 34.89%、14.65%和 3.26%,城乡老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个体特征方面,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亦存在一定的差异。农村老人中男性比重为 44.28%,城镇

①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时间始于 1986 年,由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公布。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 10 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9 个省(区)。

老人中男性的比重为45.89%;农村老人平均年龄为85.85岁,城镇老人平均年龄85.79岁;农村老人配偶健在的比重为38.39%,城镇老人配偶健在的比重为38.55%,在性别、年龄与婚姻方面二者无显著差异。农村老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80年,城镇老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2.85年;健康状况方面,农村老人自评不健康的比重为17.60%,城镇老人自评不健康的比重为17.12%。在以上变量方面,农村与城镇老人存在显著差异。

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农村老人家庭人均收入为24319.98元,城镇老人家庭人均收入为35725.54元。农村老人中职业为公务员、工人与农民的比重分别为3.14%、5.56%与83.69%;城镇老人与之对应的比重分别为11.91%、22.58%与54.09%。农村老人享有养老保险、新农合、城镇职工医疗、城镇居民医疗和公费医疗的比重分为19.71%、84.84%、2.44%、2.10%和1.52%;城镇老人享有的比重分别为26.66%、50.03%、16.02%、12.11%和7.06%。在家庭收入、职业类型与社会保障方面,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存在显著的差异。此外,在农村被访者中属于中部区域的比重为22.98%,东部区域的比重为58.12%,城镇被访者中属于中部区域的比重为18.52%,东部区域的比重为61.60%,农村与城镇老人的差异并不显著。

(三) 模型构建

本研究主要关注了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对城乡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所以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对城市与农村老人分开建模,以检验相同因素对不同群体作用的差异(刘一伟,2016:77-89)。其中,城镇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回归方程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NC + \beta_2 WR + \beta_3 NC * WR + \phi + \epsilon$$

公式中, Y 表示家庭代际支持, NC 表示子女数, WR 表示居住方式; β_1 和 β_2 表示回归系数, ϕ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ϵ 为扰动项。需要指出的是, $NC * WR$ 表示子女数与居住方式的交互项,我们重点关注交叉项的系数 β_3 ,如果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各自独立影响家庭代际支持,我们预期 β_3 为零;不然,我们将观察到显著异于零的 β_3 。同理,农村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方程构建基本相似,此不赘述。

四、实证分析

(一) 子女数、居住方式对经济支持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中国老人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于成年子女的转移支付,该行为被视为子女在履行家庭代际支持的经济支持功能(刘一伟,2016:77-89)。但有学者指出如果老人子女数较少或与子女分开居住,降低了老人在经济来源方面对子女的依赖(程令国等,2013:42-54)。因此,下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子女数、居住方式对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2。

在全样本模型中,控制其他变量后,发现无论是儿子数还是女儿数,都显著提高了子女的经济支持,即子女数与经济支持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刘一伟(2014)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原因可能是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孝”文化等依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子女共同承担老人的经济供养,但老人的经济供养并不一定由子女平摊;而是子女数越多,给予父母越多。就居住方式而言,相比于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与配偶居住和独居的老人获得经济支持更多。这可以归因于子女出于补偿心理,弥补自己没能在父母身边照料的不足。需要说明的是,居住养老机构的老人获得经济支持较少,我们认为由于子女已经给付养老机构酬劳,其在养老机构享受的服务自身不再给付,故子女减少了经济支持。

在分样本模型中,子女数对老人的经济支持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从回归系数符号上看,子女数与经济支持均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全样本得出的结论一致。但居住方式对不同户口类型老人获得经济供养的影响不同。首先,相比于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无论是城镇老人还是农村老人,与配偶居住获得经济支持更多。其次,居住养老机构的城镇老人获得经济支持较少,但居住养老机构对农村老人是否获得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养老机构设施和服务更为全面,降低了老人自身所需的支出,而农村养老机构则不然。最后,独居对城镇老人是否获得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影响,但独居显著提高

了农村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决定城乡老人选择独居因素不同所致,城镇老人选择独居的原因可能正如国外学者 Engelhard et al. (2005)研究发现所述,当预算约束放松后,独居带来的隐私和自主权是一种正常品,城镇老人对独立居住需求就会相应增加,这从侧面证实了独居的城镇老人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事实,进而挤出了子女的经济支持;农村老人独居的主要原因是支撑传统大家庭的基础不断被侵蚀,分家已然成为农村场域普遍的事实,但农村老人的收入相对较低,提高了子女的经济支持。

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年龄越大,城镇老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配偶健在的农村老人获得经济支持也较低;受教育程度越高和家庭收入越多,城镇老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在社会保障方面,医疗保险挤出了子女的经济支持;此外,相比于西部的老人,东部的城乡老人获得经济支持更多。

表 2 子女数、居住方式对城乡老人经济支持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城镇		农村	
儿子数	0.406***	(0.045)	0.395***	(0.066)	0.425***	(0.061)
女儿数	0.452***	(0.041)	0.448***	(0.061)	0.461***	(0.055)
与配偶居住	0.738***	(0.260)	0.484*	(0.276)	1.044***	(0.357)
独居	0.260	(0.170)	0.219	(0.255)	0.271**	(0.126)
养老机构	-1.291***	(0.483)	-1.854***	(0.583)	0.378	(0.952)
户籍	-0.073	(0.119)				
性别	0.043	(0.130)	-0.107	(0.193)	0.278	(0.175)
年龄	-0.0134**	(0.006)	-0.0186*	(0.010)	-0.010	(0.008)
婚姻	-0.475*	(0.258)	-0.268	(0.373)	-0.725**	(0.356)
受教育程度	0.025	(0.023)	0.0612*	(0.032)	-0.029	(0.032)
职业类型						
工人	0.104	(0.335)	0.273	(0.411)	-0.139	(0.641)
农民	0.267	(0.327)	0.395	(0.428)	0.267	(0.544)
其他	0.711**	(0.362)	0.757	(0.468)	0.857	(0.605)
log 家庭收入	3.66e-06*	(0.000)	6.64e-06**	(0.000)	-1.12E-07	(0.000)
健康	0.086	(0.142)	0.207	(0.212)	-0.026	(0.189)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0.130	(0.133)	-0.170	(0.191)	-0.105	(0.184)
新农合	-0.723***	(0.162)	-0.670***	(0.231)	-0.784***	(0.232)
城镇职工医疗	-1.140***	(0.310)	-1.049***	(0.356)	-3.629***	(0.925)
城镇居民医疗	-0.433*	(0.253)	-0.454	(0.307)	-0.126	(0.522)
公费医疗	-0.940**	(0.393)	-1.655***	(0.466)	-2.148**	(0.861)
区域(0=西部)						
中部	0.445**	(0.185)	0.538**	(0.267)	0.378	(0.255)
东部	0.436***	(0.150)	0.473**	(0.211)	0.407*	(0.213)
Constant	3.496***	(0.745)	3.613***	(1.067)	3.242***	(1.057)
R-squared	0.078		0.083		0.082	
Observations	4500		2333		2167	

注:显著性水平***p<0.01,**p<0.05,*p<0.1。

(二) 子女数、居住方式对精神支持的影响

代际支持不仅表现为资源互换的功利性,更具有以亲情和利他为核心的情感性,因此根据前文构建的 Logit 回归模型,表 3 分析了子女数、居住方式对精神支持的影响。

在全样本模型中,控制其他变量后,发现子女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表明了子女数越多,老人获得精神支持越多。另一个重要自变量居住方式结果显示,与配偶居住、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均弱化了子女的精神支持,相比于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与配偶居住、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的老人获得精神支持的概率分别为 31%、64%和 12%。可能的原因是与子代居住,老人与子女交谈、求助或者分享心事的机会更大且更为便捷,而其他居住方式受限于时空,影响了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支持。

从分样本模型来看,子女数、居住方式对城乡老人精神支持的影响不同。就子女数而言,随着子女数的增多,老人获得精神支持的可能性升高,且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可能解释的是:无论是城镇还是

农村,子女对老人的情感支持与交流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来表达,故子女数越多,可能对精神支持越多。在居住方式方面,与配偶居住和居住养老机构均降低了老人获得精神支持的概率,且城乡之间没有出现显著差异。但独居对城乡老人精神支持的影响出现了显著差异,在城镇中,独居在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而在农村中,独居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独居老人获得精神支持的概率是与子女居住的 53%,造成城乡差异现状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农村社区或者社会组织发展相对落后,无法提供给独居老人诸多类似精神支持的养老服务(如家政服务 etc);同时,农村子女外出务工者较多,居住距离在客观上制约了父母与子女间面对面的互动,这势必造成“留守”或者“空巢”老人精神支持的缺失。

表 3 子女数、居住方式对城乡老人精神支持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城镇		农村	
儿子数量	0.170***	(0.030)	0.118***	(0.042)	0.239***	(0.044)
女儿数量	0.148***	(0.027)	0.166***	(0.039)	0.131***	(0.039)
居住安排						
与配偶居住	-1.183***	(0.141)	-1.287***	(0.195)	-1.041***	(0.208)
独居	-0.497***	(0.118)	-0.205	(0.170)	-0.805***	(0.168)
养老机构	-1.763***	(0.260)	-1.816***	(0.304)	-1.673***	(0.530)
户籍	-0.088	(0.077)				
性别(0=女)	0.373***	(0.085)	0.343***	(0.120)	0.440***	(0.124)
年龄	-0.002	(0.004)	0.006	(0.006)	-0.0105*	(0.006)
婚姻(0=丧偶)	-1.687***	(0.148)	-1.475***	(0.203)	-1.989***	(0.222)
受教育程度	-0.0295**	(0.014)	-0.027	(0.019)	-0.0362*	(0.021)
职业类型(0=公务员)						
工人	0.23	(0.202)	0.16	(0.234)	0.371	(0.419)
农民	0.0217	(0.198)	-0.0819	(0.247)	0.283	(0.364)
其他	0.233	(0.225)	0.287	(0.280)	0.275	(0.408)
log 家庭收入	1.19E-06	(0.000)	2.00E-06	(0.000)	3.03E-08	(0.000)
健康(0=不健康)	0.041	(0.092)	-0.018	(0.132)	0.105	(0.130)
养老保险	-0.074	(0.085)	0.138	(0.119)	-0.274**	(0.125)
新农合	0.159	(0.106)	0.059	(0.144)	0.314*	(0.161)
城镇职工医疗	0.265	(0.192)	0.138	(0.210)	0.923	(0.617)
城镇居民医疗	0.489***	(0.168)	0.474**	(0.199)	0.163	(0.353)
公费医疗	-0.02	(0.241)	0.055	(0.274)	-0.535	(0.535)
区域(0=西部)						
中部	0.309**	(0.122)	0.267	(0.171)	0.349**	(0.176)
东部	0.269***	(0.096)	0.0556	(0.131)	0.479***	(0.144)
Constant	1.154**	(0.481)	0.554	(0.656)	1.376*	(0.737)
Pseudo R2	0.241		0.252		0.241	
Observations	4832		2504		2328	

注:显著性水平***p<0.01,**p<0.05,*p<0.1。

在不同户口类型老人中,控制变量对精神支持的影响亦存在异同。性别与婚姻对城乡老人精神慰藉的影响方向一致,但是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及区域对城乡老人精神支持的影响不同。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与农村老人精神支持呈显著负相关,而受教育程度对城镇老人是否获得精神支持没有显著影响;就社会保障而言,新农合提高了农村老人的精神支持,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提高了城镇老人的精神支持;此外,与西部区域的农村老人相比,中、东部农村老人获得精神支持的概率更大,但区域对城镇老人精神支持没有显著影响。

(三) 子女数、居住方式对照料支持的影响

表 4 分析了子女数、居住方式对照料支持的影响,同样采用 Logit 回归模型。在全样本模型中,儿子数和女儿数对老人照料支持影响方向不同。其中儿子数与照料支持呈正相关,而女儿数与照料支持呈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年老之后与至少一个已婚儿子同住并接受子孙的赡养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这提高了儿子照料的可能性;而女儿出嫁后,受限于时空,从而降低了女儿照料支持的可能。需要

指出的是,与配偶居住、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表明相比于与子代居住的老人,其他居住方式的老人获得子女照料支持的概率更低,原因可能正如 Becker(1974:1063-1093)指出的那样,老人与子代同住可以实现家庭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效应,并从子女处获得诸多隐性的生活照料,但这种隐性照顾有时不一定被人们察觉。同时,与非同住子女相比,同住的便利性使同住子女更多地担负起日常照料父母的义务。

表 4 子女数、居住方式对城乡老人照料支持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城镇		农村	
儿子数量	0.437***	(0.031)	0.403***	(0.042)	0.487***	(0.046)
女儿数量	-0.0669**	(0.026)	-0.05	(0.036)	-0.0780**	(0.039)
居住安排						
与配偶居住	-1.279***	(0.124)	-1.377	(0.886)	-1.210***	(0.166)
独居	-0.562***	(0.090)	-0.359	(0.335)	-0.773***	(0.124)
养老机构	-2.828***	(0.305)	-2.670***	(0.361)	-3.023***	(0.576)
户籍	-0.136*	(0.076)				
性别(0=女)	0.012	(0.083)	0.014	(0.115)	-0.003	(0.122)
年龄	0.0130***	(0.004)	0.0110*	(0.006)	0.0163***	(0.006)
婚姻(0=丧偶)	-1.208***	(0.147)	-1.018***	(0.201)	-1.442***	(0.219)
受教育程度	-0.01	(0.014)	-0.012	(0.019)	-0.005	(0.022)
职业类型(0=公务员)						
工人	0.003	(0.209)	-0.037	(0.239)	0.163	(0.435)
农民	0.419**	(0.201)	0.362	(0.244)	0.569	(0.371)
其他	0.410*	(0.224)	0.317	(0.268)	0.704*	(0.418)
log 家庭收入	4.39e-06***	(0.000)	5.38e-06***	(0.000)	3.52e-06*	(0.000)
健康(0=不健康)	0.147	(0.090)	0.372***	(0.126)	-0.089	(0.132)
养老保险	-0.005	(0.085)	-0.196*	(0.114)	0.190	(0.131)
新农合	0.401***	(0.103)	0.624***	(0.136)	0.124	(0.164)
城镇职工医疗	-0.023	(0.201)	0.012	(0.214)	0.722	(0.633)
城镇居民医疗	-0.11	(0.158)	0.068	(0.178)	-0.227	(0.371)
公费医疗	0.062	(0.247)	0.211	(0.275)	-0.679	(0.535)
区域(0=西部)						
中部	-0.029	(0.118)	0.067	(0.160)	-0.182	(0.181)
东部	0.101	(0.096)	0.217*	(0.125)	-0.064	(0.150)
Constant	-1.181**	(0.466)	-1.578**	(0.625)	-0.997	(0.726)
Pseudo R2	0.274		0.261		0.298	
Observations	4837		2511		2326	

注:显著性水平***p<0.01,**p<0.05,*p<0.1。

在分群体模型中,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儿子数与照料支持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女儿数仅在农村样本中显著,且对老人照料支持起到了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农村的家庭网络模式更松散,即子女尤其是女儿住得较远,彼此之间保持较少的联系。此外,不同居住方式对城乡老人照料支持的影响不同,一方面,相比于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居住养老机构的老人获得子女照料支持的概率最低,且城乡没有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在城镇中,与配偶居住和独居在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但在农村中,与配偶居住和独居的老人获得子女照料支持的概率更低,其概率分别是与子女居住老人的 29%和 46%。上述结果表明与配偶居住和独居对城乡老人获得照料支持的影响不同,造成城乡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两点:一是伴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居住方式发生改变,由于与子女居住无法实现,老人在需要子女照料时只能选择配偶照料或者雇人照料,甚至导致独居老人无人照料;二是在城镇中,子代和父代一般生活在同一城市,居住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老人身体不舒服或生病时,子女能够及时的提供照料。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年龄与城乡老人获得的子女照料支持呈正相关,婚姻与城乡老人获得的照料支持呈负相关。就社会经济特征而言,无论是城镇老人还是农村老人,家庭收入越多,其获得的子女照料支持越多;自评健康对城乡老人的生活照料影响不同,与不健康的人相比,自评健康一般或自评健康

的城镇老人获得生活照料更多,而健康状况对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耐人寻味,我们认为由于被访者属于高龄老人(平均年龄 85 岁左右,见表 1),如果自评不健康,可能是卧病在床甚至是失能老人,需要专业的护理人员进行生活照料,进而挤出了子女的生活照料。从职业类型上看,与公务员相比,无论农村还是城镇,职业身份为农民的老人获得子女的照料支持更多。在社会保障方面,养老保险对城镇老人的照料支持影响不显著,但养老保险降低了农村老人获得子女照料支持的概率。此外,区域特征在城镇的样本中显著,与西部老人相比,东部老人获得子女照料支持的概率更大。

（四）子女数与居住方式交互作用的影响

前文讨论了子女数和居住方式对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均将子女数与居住方式作为单独因素进行检验。然而,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还是可以交互作用,即居住方式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是否会因子女数不同而影响不同。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表 5 报告了子女数与居住方式交互作用的回归结果。首先,在经济支持方面,子女数在调节居住方式与经济供养的关系中不存在城乡差异。其次,在精神支持方面,子女数对不同居住方式城乡老人的调节效应不同,子女数弱化了同配偶居住对农村老人精神支持的负向影响,但同配偶居住与城镇老人精神支持的关系并没有因子女数而改变。最后,在生活支持方面,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女儿数对居住方式与照料支持的关系均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与配偶居住对照料支持的关系因儿子数的增加而强化,且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儿子数调节了独居与城镇老人照料支持的关系,但儿子数与独居交互对农村老人照料支持的影响不显著。

表 5 子女数与居住方式交互作用的影响

变量	经济供养		精神慰藉		生活照料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儿子数	0.352*** (0.084)	0.404*** (0.081)	0.116** (0.057)	0.372*** (0.069)	0.546*** (0.053)	0.691*** (0.074)
女儿数	0.491*** (0.080)	0.526*** (0.075)	0.146*** (0.055)	0.188*** (0.060)	-0.146*** (0.041)	-0.205*** (0.051)
与配偶居住	-0.321 (0.393)	0.599 (0.398)	-2.628*** (0.213)	-1.439*** (0.238)	-2.426*** (0.213)	-2.270*** (0.251)
独居	-1.235** (0.493)	-0.209 (0.492)	-1.337*** (0.261)	-1.101*** (0.295)	-1.208*** (0.240)	-1.420*** (0.283)
养老机构	-3.751*** (0.664)	-4.862*** (1.136)	-2.731*** (0.354)	-1.899*** (0.646)	-3.240*** (0.500)	-6.918** (2.704)
与配偶居住	0.160 (0.136)	0.0648 (0.129)	0.0147 (0.076)	0.281*** (0.088)	0.260*** (0.077)	0.469*** (0.095)
x 儿子数	0.397** (0.172)	0.328** (0.156)	0.246** (0.108)	0.0342 (0.115)	0.194* (0.104)	0.0315 (0.119)
养老机构	0.485 (0.320)	0.483 (1.056)	0.219 (0.162)	0.439 (0.396)	0.064 (0.182)	0.685 (0.715)
与配偶居住	0.0111 (0.126)	0.0794 (0.118)	0.0103 (0.072)	0.183*** (0.070)	0.212*** (0.067)	0.183** (0.076)
x 女儿数	0.187 (0.167)	0.103 (0.146)	0.336*** (0.114)	0.288** (0.116)	0.144* (0.082)	0.260*** (0.091)
养老机构	0.956** (0.381)	2.457*** (0.903)	0.459** (0.220)	0.448 (0.401)	0.521** (0.217)	2.175** (1.023)
x 女儿数	3.183*** (0.246)	3.414*** (0.235)	1.317*** (0.151)	0.720*** (0.158)	0.391*** (0.122)	0.773*** (0.154)
Constan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063	0.078	—	—	—	—
Pseudo R2	—	—	0.2443	0.1956	0.2472	0.2713
Observations	3377	2585	3595	2742	3691	2810

注:显著性水平***p<0.01,**p<0.05,*p<0.1。

事实上,子女数既可以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支持,还可能通过居住方式影响家庭代际支持。子女数之所以能够调节居住方式对城乡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可能如下: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崇尚“颐养天年”,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老年时期享受到“天伦之乐”,当自己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孩子多了,能够孝敬自己的人就多,老年生活就有保障。这种观念得到了中国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维护和强化,老者是家庭的中心,家庭伦理强调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居住方式并不能改变子女孝道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虽然随着时代变迁,“子”的含义由儿子向儿女转变,但传统观点仍认为多子女能提供更好的养老保障,能让老人安享晚年。多子多福的观念与行为是在当代条件下人们回应资源约束的一种生存理性,也是老人获取家庭代际支持的重要条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子女数在调节居住方式对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上存在城乡差距,尤其是受传统观念影响更为深入的农村,其可能对家庭代际支持的效应更为凸显,这点在表 5 的回归结果中已经得以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目前,随着现代化、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多样化,这可能影响了老年人的家庭代际支持,甚至对我国老年人如何实现“老有所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 2011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将家庭结构分为居住方式与子女数量两个维度,以城乡差异的分析视角,实证分析了家庭结构对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本项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子女数对城乡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不同。无论是儿子数还是女儿数,均与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子女数越多,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与精神支持越多。但女儿数仅在农村样本中显著,且对老人照料支持起到了负向影响。

第二,居住方式影响了老人的家庭代际支持,且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对城镇老人而言,相比于与子代居住的老人,与配偶居住虽然挤入了子女的经济支持,但对老人的精神支持起到了负向影响;同时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分别降低了老人获得精神慰藉和照料支持的概率。对农村老人而言,与同子女居住的老人相比,与配偶居住在挤入子女经济支持的同时,还挤出了子女的精神支持与照料支持;此外,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对老人获得子女的精神支持和照料支持均起到负向影响。

第三,子女数调节了居住方式与家庭代际支持的关系。首先,在经济支持方面,子女数在调节居住方式与经济供养的关系过程中不存在城乡差异。其次,在精神支持方面,子女数弱化了同配偶居住对农村老人精神支持的负向影响,但同配偶居住与城市老人精神支持的关系并没有因子数而改变。最后,在照料支持方面,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与配偶居住对照料支持的影响因儿子数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女儿数对居住方式与照料支持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儿子数调节了独居与城镇老人照料支持的关系,但儿子数与独居交互对农村老人照料支持的影响不显著。

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大家庭居住模式的变迁已经显著影响了城乡老人的家庭代际支持。这可能正如家庭现代理论预测的那样,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在弱化原有居住方式的同时,也孕育了功利主义的消费文化,且促进了与之关联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由此产生了两代人在价值观念上的代沟,导致子女对“母家庭”的疏离;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观念的冲击,传统文化的约束力在不断消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子女数越多,不但可能提高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概率,还可能增加每个子女对老人的代际支持,进而调节居住方式对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养儿防老”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不断再生及子女对老人赡养义务的认可。事实上,子女数与居住方式作为影响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重要因素,在实现我国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目标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子女在尊重老人选择居住方式的同时,可以弥补因居住方式导致代际支持的缺失。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降低了我国的生育水平,致使我国居民生育子女数量的减少,这可能不利于子女数调节因居住方式的改变对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负向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在有关学者和专家的呼吁之下,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普遍二孩政策,允许一

对夫妇可以生育二胎。事实上,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不但能够适度提高中国综合生育率,保持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而且改善了家庭结构严重失衡现象,进而减少“倒金字塔”型家庭的数量,提高家庭代际支持能力,并降低家庭养老风险,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随着家庭居住安排从同居向分居的方向发展,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趋势也日渐凸显,虽然子女仍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支持来源,但是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子女的代际支持。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善的现状下,家庭结构的变化可能对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提出新的挑战。因此,一方面,我国政府应该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将正式的社会支持嵌入到老年人的生活中,实现社会保障与家庭代际支持的良性互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认真践行和贯彻中央有关“二胎”的政策,在政策的允许范围内,提高我国的生育率。与此同时,应当继续开展孝顺父母的传统价值观教育,针对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壮年群体,出台有关政策鼓励其常回家照料老人;而城镇子女应当向居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精神慰藉和照料支持。总之,我国应当重视并规避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代际支持可能产生的负向影响,以便解决我国老年人的养老困境,从而让老年人生活的安心、舒心和静心。

参考文献:

- [1] 程令国等(2013).“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 经济研究,8.
- [2] 狄金华等(2014).老人居住模式与养老资源获取——对谢桂华研究的再检验.北京社会科学,5.
- [3] 费孝通(1983).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 [4] 桂世勋等(1995).老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研究.人口研究,6.
- [5] 郭志刚、张恺悌(1996).对子女数在老年人家庭供养中作用的再检验——兼评老年经济供给“填补”理论.人口研究,2.
- [6] 胡仕勇(201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对家庭养老影响研究.社会保障研究,3.
- [7] 刘一伟(2014).挤入还是挤出? 新农保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河南省 HX 市为例.农村经济,9.
- [8] 刘一伟(2016).互补还是替代:“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基于城乡差异的分析视角.公共管理学报,4.
- [9] 约翰·罗根、迈馥琴(2003).城市老年人口与已婚子女同住的观念与现实.中国人口科学,2.
- [10] 石智雷(2014).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公共管理学报,4.
- [11] 王 硕(2016).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西北人口,3.
- [12] 夏传玲(2007).老年人日常照料的角色介入模型.社会,3.
- [13] 夏传玲、麻凤利(1995).子女数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人口研究,1.
- [14] 谢桂华(2009).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社会,5.
- [15] 熊 波、石人炳(2014).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类型的再分析——基于对湖北省两个地区的调查.人口与发展,3.
- [16] 徐 蒙、陈 功(2009).宗法制度对中国古代尊老、恤老制度的影响.西北人口,2.
- [17] 鄢盛明等(2001).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
- [18] 杨复兴(2007).中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历史分期及前景探析.经济问题探索,9.
- [19] 杨菊华(2011).父母流动、家庭资源与高中教育机会.学海,2.
- [20] 原 新(1999).21 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生育率与人口规模·老龄化的前瞻.西北人口,4.
- [21] G. S. Becker(1974).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6).
- [22] G. V. Engelhard et al. (2005). Social Security and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Evidence from the Social Security Notch.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0(2).
- [23] W. J. Goode(1963).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 [24] Lee et al. (1994).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4).
- [25] J. R. Logan et al. (1998).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Social Forces*, 76(3).
- [26] M. K. Whyte & W. L. Parish(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9(4).

- [27] Z. Zimmer & J. L. Kwong (2003).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 *Demography*, 40(1).

Number of Children, Way of Residence and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Yin Jun & Liu Yiwe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ag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problem. Family modernization theory predicts that the deepening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weakening the extended kinship, and the traditional family form will become looser; the core family will become an independent unit of relatives. As one of the family syst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ldren's feedback or support to their parents after adulthood has long been of interest to scholars.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living arrangements, number of children or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greatly affect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way of residence in the family interdependence in the role played, and then how to achieve the elderly in our "old age" has a profound impact. Therefore, it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way of residence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the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This study mainly uses the follow-up survey data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lderly health in China in 2011, and constructs Logit regression model. It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n's number and residence style on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way of residence.

First of all,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economic support and ment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However, the number of daughter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are support of rural elderly. Second,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ity, living with the spouse concerns the children's economic support, but the elderly to obtain spiritual comfort played a negative impact; living alone and living institutions to reduce the elderly to obtain mental support and care support probability.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with the spouse living in the support of children's economic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but out of the children's spiritual comfort and care support; living alone and living pension institutions for mental support and care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to play a negative impact.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djusted the impact of residence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living arrangements from cohabitation to separation, the trend of miniaturization of family siz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lthough the children are still the main source of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but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this change, inevitably in a certain degree weakened the child'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especiall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in rural areas, the formal social support embedded in the lives of the elderly to achieve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support the positive complement; on the other hand, local governments earnestly carry out and implement "The Two-child Policy", in the scope of the policy to allow China to improve the fertility rate. In shor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avoid the family structure changes on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may have negative imp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old age of our old age, so that the elderly living peace of mind, comfortable and meditation.

Key words: living arrangements; number of childr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 收稿日期: 2016-11-03

■ 作者地址: 殷俊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刘一伟,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40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673176, 71373152)

■ 责任编辑: 叶娟丽